

从“跨省侗乡”到“中国侗族”

——侗学研究的表述贡献

徐新建¹ 郑玮^{1, 21}

(1.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4;

2.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侗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值得回顾展望。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侗学研究出现了显著的多维拓展。其中的突出标志, 在于提出了话语表述上的概念系列, 值得关注的有“跨省侗乡”“无冕王国”“文化边地”及“中国侗族”等。这些成果对于侗学的局部自身来说意义重大, 对于侗学之外的宏观外围而言, 也标志着当代民族研究与人类学理论整体中不可忽略的重头之戏。

【关键词】: 侗学 人类学 跨省侗乡 中国侗族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3-0098-08

侗学, 是指以侗族文化为对象、从交叉综合的视野出发、多样阐发侗人社会与历史变迁的一门动态学问或交汇论域。侗学研究可谓古今承继, 源远流长。其中的成果, 尽管古今有别, 但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也称得上林林总总, 包括了侗人内部的口碑传诵以及汉语文献的多样记载。晚清以来, 经过中西交汇的多重助推, 侗学研究更展示出与其他民族同步并进的长足演进。20 世纪八十年代,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推动下, 侗学研究又出现了更为显著的深远拓展。其中的重要标志, 便是提出了本文所要阐述的新概念系列。

一、多元演变的共同体表述

中国是一个古今关联及各族并存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近代以来, 在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背景下, 如何完整准确地建造和表述中国共同体, 成为了上下关心、四方参与的国之大事。晚清民初的时候, 先是出现过兴中会、同盟会等宣告的“驱除鞑虏”主张,¹接着因对“五族共和”说的局限不满, 杨汉先、梁聚五等西南少数民族代表提出应在国家共同体中增添“西南苗夷”⁽²⁾的诉求。1949 年后, 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联合发布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 进一步提出创建前所未有之新中国, 终于明确强调了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彼此平等的基本主张。⁽³⁾

总体而言, 在现代国家的创建及认知意义上, 20 世纪以来的共同体表述经历了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多层演变。其中的核心是以“多元一体”为主调的国家构架。

¹**作者简介:** 徐新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

郑玮, 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

基金项目: 教育部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17JJD730002)

在共同体表述的百年进程中，华夏学界的多学科阐释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学家费孝通、考古学家苏秉琦、地理学家陈正祥先后提出的“乡土中国”⁽⁴⁾“满天星斗”⁽⁵⁾“中心迁移”⁽⁶⁾及海外学者杜维明阐述的“文化中国”⁽⁷⁾等学说，都为现代中国的表述谱系奠定了博大根基。

正是在这样的参照中，让我们见到了“多元一体”的国家叙事格局内，多民族研究的表述贡献，就是提出了费孝通赞之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⁸⁾式的新概念系列。这些新提法和新概念如同整体谱系里的中观桥梁，与同期涌现的“长城内外”⁽⁹⁾、“半月文化带”（童恩正）⁽¹⁰⁾及“汉藏之间”（王明珂）⁽¹¹⁾等一道，进一步扩展了表述中国的话语格局。

在这样的话语格局驱动下，经过半个多世纪从理论到实践的长期互动，形成了彼此映照的多民族话语。其中，以侗族文化为对象的侗学研究也可谓成果突出，创建了值得总结的独特体系。在笔者看来，其最突显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相互关联的四组概念，即：“跨省侗乡”“无冕王国”“文化边地”与“中国侗族”。

二、“跨省侗乡”的区域关联

20世纪后半叶启动编写的《侗族简史》首先强调“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继而便以此为前提，揭示了侗族在国家版图内的跨界分布特征。《侗族简史》写道：

侗族分布于湘、黔、桂毗连地区和鄂西南一带，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侗族人口共有2960293人，其中贵州省有1628568人，占55%；湖南省有842123人，占28.4%；广西壮族自治区有303139人，占10.2%；湖北省有69947人，占2.4%；其余散居在全国所有省份。

在新中国的重建共同体表述的转型意义上，《侗族简史》的描叙可视为以集体叙事方式，最早展现“跨省侗乡”的侗学事例。

“跨省侗乡”的表述意义，在于强调了侗人分布的跨行政特征：一方面与多元一体的国家疆界呼应，同时又凸显了族群自身的区域意义。这种国家与地方双向兼顾的跨界表述，对于侗学研究的框架构成可以说影响深远，持续至今。围绕侗族的跨界传统、文化凝聚乃至经济开发等议题，侗学研究者各抒己见，提出了“黔湘桂侗族聚居区”“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多种不同的观念命名和实践主张。这些表述凸显了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强调了侗族成员在居住分布与文化构成上的空间关联与文化整体。以此为基础，便可获得进一步的概括与发挥，亦如有学者展示的那样：

整体意义上的侗族文化，涵盖了语言、信仰、服饰、饮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风俗习惯、礼仪节庆、民间艺术、手工技艺等诸多方面，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地方特色。⁽¹²⁾

另有学者从旅游开发角度，提出了“湘黔桂侗族旅游圈”的提法，阐释说：

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圈是以三省坡为核心，以东西向的交通干线为横轴，以南北向的交通要道为纵轴，以横轴与纵轴的旅游流向关系为基本依托的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并形成一核心、三个圈层、四条轴线的区域网状格局的基本构架。⁽¹³⁾

在笔者看来，在各式各样“跨省侗乡”的侗学表述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对“三省坡”的跨界阐发。正如吴浩作品所描绘的那样：

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交界处有一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三省坡。她就像一座威严耸立的侗寨鼓楼，将黔湘桂三省(区)250多万侗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¹⁴⁾

作家杨志一认为，这样的论述将科学性与文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代表了“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体现了“侗族学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水平”。⁽¹⁵⁾在石佳能和石干成等学者眼里，“三省坡”象征着侗族文化的原生主体，希望通过以三省坡为核心，建立“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留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¹⁶⁾

在后来的媒体传播话语里，有关“三省坡”的跨界表述得到进一步发挥，被渲染为三省区侗族同胞共同的“精神地标”和“世外桃源”，鼓舞分布各地的侗族人民由此凝聚，不同而和，谱写族群认同、四方呼应的“大侗乡”畅想曲。⁽¹⁷⁾

延伸来看，在人类学的实地调研及阐释中，“跨省侗乡”的表述范式也得到了学者们各显特色的发挥运用。以笔者的考察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考察黔桂地区的侗歌民俗，就在《沿河走寨“吃相思”》等论述中突出了侗族社会“以歌为媒”的跨界关联。⁽¹⁸⁾

结合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侗人社会之所以普遍存在地域上的跨界交往，原因在于国家行政的区划设置与族群分布的错位脱节。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不断变异的官方区划与在世代传承中相对稳定的民间格局每每不相对应，形成了实际生活中各具功效的两套系统。以贯穿黔桂两省的都柳江流域为例，历史上，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沿岸民众关系紧密，存在着彼此关联的侗款组织并流传着内容相近的“祖公落寨歌”。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现实情景，通过民间歌手“走乡串寨”式的交往互动，“不少带有地域特征的侗歌才可能在方圆数百里的范围此起彼伏，交错呈现。”⁽¹⁹⁾也正是以这样的案例为基础，笔者强调说黔、桂、湘省区侗族人群的跨省交往值得关注，因为——长久以来，他们的认同并不以省、县划界，而更注重语言、习俗或房族、姻亲等方面的关联。⁽²⁰⁾

在龙宇晓的论述中，跨省侗乡的异中有同则与现代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相呼应，形成中观与宏观间的结构关联。对此，龙宇晓作出了族情与国情互文阐释的重要结论：揭示侗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及其与民族认同一致性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促进对于侗族这个族体形成过程和机理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深化文明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理解。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正是由于有着像侗族这样一个支系纷繁的多元一体民族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²¹⁾

三、“无冕王国”的前沿贡献

“无冕王国”之说主要出自邓敏文和吴浩。他们在侗款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将侗族社会形容为“没有国王的王国”，亦即“无君无臣”社会和世外一般的自治桃园。⁽²²⁾此说不仅与费孝通对农耕中国“乡土性”特征的概括形成呼应，并做出了由夷夏比较而生发的深入阐释。

“无冕王国”说将侗人社会与陶渊明描绘的古代“桃花源”关联在一起，突出了国家政权之中与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类型，即乡民自治的世外桃源。

东晋时期，陶渊明等文人笔下的“桃花源”堪称异类。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下，人们耕种为生，且因不与外界交往，“男女衣着，悉如外人。”⁽²³⁾

这样的情形被邓敏文作了转述和发挥。在《桃源深处是侗乡——〈侗款研究〉引论》里，作者先是突出“鸡鸣狗吠遥相呼应，耕田种地的人来来往往……完全象另外一个世界”的彼时场景，而后对“桃花源”人群何以居此的文化缘由加以强调，即“为避战乱，与世隔绝”。以此为基础，邓敏文分析说，侗族的母语自称“宁更”（nyencgueml），包含着“隐匿”“藏匿”或“掩蔽”等意，因此，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可以理解为湘桂一带的侗款社会，其中的乡民就是今天的侗族。⁽²⁴⁾

邓敏文对“桃花源”文献的理解阐发做了重要贡献，首先是将传说坐实，认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并非陶渊明等个别文人的虚幻想象，而是历史场景中的实有类型，《桃花源记》的诗意景致不过是对现实存在的文学渲染罢了；其次是把应做实有观

的世外桃源与如今所知的侗族地区相关联，用作者的话说，即陶渊明等人描绘的场景“在古老边远的侗族山寨里长期并存，直至今天仍未完全消逝”；结论：“这就是侗族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世外桃源’。”⁽²⁵⁾第三，作者再借王安石的诗句对世外桃源与侗人社会的组织特征作了总结，那便是“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²⁶⁾

正是以对“桃花源”记载的重新阐释为基础，邓敏文立下了承继创新的侗学志愿，表示要迈进文化人类学殿堂，对“虽有父子无君臣”的侗族社会进行深入研究，考察其组织结构和演变过程，辨析族群内部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管理。

接下来，邓敏文与学生兼同道吴浩合作，将上述思考撰写成专著，以《没有国王的王国》为题出版，正式提出“无冕王国”之说，将其归为“封闭型”社会和文化，总结出两个主要特征：1) 自治性，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2) 自卫性，也就是自己保护自己。依照作者的论述，侗人社会的“自治性”属于自然经济的产物，“自卫性”则由农业经济所派生。⁽²⁷⁾

邓敏文等笔下和理想中的侗人社会不是“王国”，人们间的关系也非政治化的君臣而是亲缘般的父子。侗人所在的世外桃源顶多只能叫做“款国”——依款而建、由款连接的无冕之国。

杨志一认为，侗人之“款”是“前国家组织结构的一块活化石，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²⁸⁾邓敏文指出，“‘款’是侗族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组织形式……具有原始氏族社会和原始部落联盟的许多特征。”在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政治学意义上，侗款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行使着国家出现以前或国家权力之外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管理权力和管理方式，其中包括基础的和上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生产的和生活的等等。⁽²⁹⁾

向零论述说，“款是一种村寨联盟组织，有大款小款之分，小款由一洞或数洞组成，大款由十数洞、数十洞、上百洞的地区组成。”这样的模式在侗族地区世代相沿，直到王朝设立官府或设置土司后也未改变，“村寨头人、款首仍然是管理民众事务的组织者、领导者。”这样的情形延续到近代，演绎出内外有别的双层系统，位于内部并发挥实际作用的，便是堪称“里层组织”的侗款结构。⁽³⁰⁾

结合世界性的跨文化研究成果来看，侗学研究者通过“无冕王国”的概念强调侗人社会的“无冕性”（“无王性”）、“封闭性”及“合款式”组织方式，揭示了跨省族群的自给传统和自治特性，较之后来斯科特以“佐米亚”（Zomia）为例阐述的“文明不上山”之论早了许多年。

美国耶鲁大学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聚焦东南亚及中国西南跨境地带的山地文化，以“佐米亚”之称对该区域加以命名，并通过考察对比，提出了其“无国家”（stateless）的文化特征。2009年，斯科特的著作出版，正标题叫做“不被统治的艺术”。

“佐米亚”意指“遥远的山里人”，近似于“世外桃源”的民众。在斯科特笔下，“佐米亚”意味着非国家的地区和无国家的历史；⁽³¹⁾它的存在，体现了古代王朝扩张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所累积的“碎片”结果。⁽³²⁾至于山民为何选择远离“文明”平地居住的原因，以中原地区的历朝动乱为例，斯科特虽也提到了避祸、逃难等原因，但多半由于文献使用的局限，如其一样的海外名家却未能引用侗学前辈的相关成果，几乎毫不知晓向零、邓敏文等侗族学者早已发表的开拓性论述。并且，在论及“国家”有无的问题上，斯科特过于单一的“无政府”论显然不及向零等分析的“侗款-王朝”内外叠构的“双系统”说。遗憾的是，由于对侗学研究的理解和重视不够，国内学人在大量引述斯科特等有关“佐米亚”论述时，也表现出对此前已有的“无冕王国”等论述的无知。

对于这样的中外错位，笔者在2017年龙宇晓主持的山地文化研讨会上做过评议，认为邓敏文、吴浩等学者有关“无冕王国”的侗学成果不是孤立，而是一批，其他还有侗族作家潘年英及苗族学者游建西等。他们提出的“温和民族”“文化边地”等重要论述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不该被忽略的当代成果。⁽³³⁾

四、“文化边地”的象征意涵

把跨界侗乡隐喻为“文化边地”有多种不同的表述类型。其中，以潘年英、张泽忠为代表的作家、艺术家写作最为凸显，可视为象征与具象的侗学成果。

作家们用象征的手法将侗人故乡边地化，展示出在传统与前途间既挣扎又超越的情感苦闷和精神抗争。表述者们从自我弱化的反讽出发，借“边地”为隐喻，把中心作为他者，用虚实结合的夸张方式表述侗乡，创建边地文学，凸显边地文化。这样的策略实质是通过精神自我的反向认同，重构族群社会的理想镜像。

作为一种有意选择的表述象征，“边地”包含丰富寓意，非但与“中心”相对、同“大都会”远离，甚至意味着与“文明”分野。在潘年英叙述中，这样的策略甚至体现有意“土著化”。在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的一次学术活动中，他就把自己的身份介绍为“土著”，然后发表题为“土著者说”的报告。内容讲什么呢？讲故乡的田野。潘年英说：

我把整个西南作为我的田野，而贵州东南山区的土著社区，则是我的田野的中心。⁽³⁴⁾

这种风格的阐发，挪用到作家作品的出版者转述里，即“在时光的边缘里行走观察，于生命的疼痛中参悟自省。”⁽³⁵⁾

对于生长于广西三江的张泽忠而言，边地就是故乡。作为学者，张泽忠继承了“无冕王国”之说，强调侗族的“封闭王国”孕育了一种不具有扩张色彩的“绿色文化”；⁽³⁶⁾作为作家，他将自己的写作称为“山乡笔记”，力图通过母亲的意象，表达故乡、民族与传统的融合。

为此，侗学研究者廖开顺和石佳能提出《山乡笔记》是一部蕴藏着“恋乡情结”的作品，需要依循民俗学式的学理路线来阅读，方能理解其中的象征寓意。该路线的图样是，从“月亮”到“母亲”再到“故乡”。⁽³⁷⁾

对于侗族文学书写的边地意义，法国评论家安妮·居里安做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的阐释发挥。她把潘年英和张泽忠等的侗乡写作称为“中国文化边界旁的文学”，揭示说这一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要表达“一个传统的侗民族的精神理想”。⁽³⁸⁾就“边地”与“中心”的象征对比，安妮分析说，潘年英笔下的边地其实才是其心中的理想家园，是一个“和谐并充满人间真情的社会”，而外面的世界及其不断引发的冲击则会对人类“造成悲剧”。也正因如此，她才总结指出潘和张的写作“具有一种边缘性质”，属于“文化边界旁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而由此一来，在传统的侗族语言与汉语文学表达之间便需要打造一条和谐通道，以促进相互的理解和沟通。⁽³⁹⁾

从人类学的表述角度看，“边地”其实是被制造的文化范畴，用以标志不对等的政治地理，代表着特定权力关系的知识话语。在用潘年英的边地表述与自己都市话语做比较时，王铭铭发表过感叹，称赞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坦诚此说为他“思索家乡文化”提供了参考。为此，王铭铭评论说，“贵州山多地少，对于习惯于平地农耕的汉人来说，不是好环境，而对于那些在汉人的‘追逐’下寻找家园的边缘族群来说，却是最好不过的归宿”，最后得出了对边缘文化的肯定结论：边缘族群在此地创造着各自的生活，他们与当地生态长期相适应，造就了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⁴⁰⁾

2002年，《光明日报》与云南大学在昆明联合举办“全国‘边地中国’高层研讨会”，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的发言，强调“边地”是相对概念，出现于“中心”确立的过程之中。在大一统的王朝时期，边地就是中央、中原以外的“四方”。从族群和文化的交往进程来看，边地的含义大致经历了从“边荒”到“边疆”再到“边界”的演变。由此强调：

中国的边地，或“边地中国”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同样拥有此种意义上的众多“原住族群”。他们的多样性存在，不仅具

有其自身的合理依据，同时还有对其他文明单位的平衡、补充与调节的功能。⁽⁴¹⁾

在以全球为背景讨论“文化中国”议题时，华裔学者杜维明提出了“以边缘为中心”的重要论断，倡导突破以往看待华夷空间的范式僵局，让文化中国由古而今所蕴含的多元能量重新释放。⁽⁴²⁾

正因有了上述这些论述为参照，笔者把侗族学者以侗乡为例彰显的“文化边地”视为族群表述的隐喻象征，同时把潘年英和张泽忠等视为同道，对他们的学术贡献引以为豪。他们以邓敏文等前辈的侗学表述为基础，将孤悬世外的“无冕王国”拓展到相互关联的多元整体，以“边地”为坐标，与自诩为“中心”的他者对话，使侗族文化的自表述获得了进一步深化和整合。

通过侗学研究的表述成果让人再次看到，边地与中心是多元关联而非上下等级。边地是一种地方，同时连接了世界；边地代表本土与个别，又何尝没有展示人类的普遍和整体？

如今，随着大地污染、环境危机日益加剧，全球工业化、都市化的众多中心不断褪去昔日风采。这样的情景恰好映照出侗乡这类“文化边地”古老厚重的生态光芒。一如张泽忠表述的那样，哪怕仅在侗族古歌诵唱的片段信息里：

我们确实看到了这地方既蛮荒、神秘又迷人……充满生机和富有诗意，的确是一块具有蛮荒、原始和混沌美的理想家园。⁽⁴³⁾

五、“中国侗族”的开合视野

2020年10月31日，“中国侗族研究回顾与展望论坛”在贵阳召开。会议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分支机构山地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文明研究中心承办。组织者发布的《会议手册》阐述说：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侗族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侗族研究一直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良好发展势头，涌现了一批积极深入侗区开展实地研究的学者，形成了数目可观的一批重要学术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⁴⁴⁾

从人类学视角凸显“中国侗族”称谓的意义重大。其学术与文化的表述意义在于将侗族群体及侗学研究并入国家整体、融进世界体系，从而启动了更大范围的跨文化关联和比较。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人类整体的观念格局中，“中国侗族”的表述使“侗人”不但成为国家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并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之与“侗台语族”“苗瑶语系”等相关范畴一道呼应互补，跨境生辉。

无论从史学还是现实来看，在侗族名称之前冠以“中国”以及在中国之内添加“侗族”，无疑都体现了现代中国在共同体形象的族群与国家双向型塑的重大转变。这样的型塑不但突破了过去以款结盟的相对封闭，同时亦通过国家化进程的提，促进了多民族中国的内在构成及其多元一体的国民认同。这一点首先在《侗族简史》这样的史学著述里得到体现，例如著者们以毋庸置疑的语气写到：

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独特的文化。⁽⁴⁵⁾

相比起民国初年西南“苗夷”为争取平等地位的族群抗争来说，将侗族与国家并连并予以正式表述，标志着政治权力的确认及其在学术话语的对应体现。其所揭示的修辞意义是：侗族是现代国家的有机部分，中国是包括了侗族的多元整体。

有了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向基础，侗学研究便在语言、建筑、音乐及民俗、信仰等领域出现了日益开阔的拓展。例如

在语言学研究中，随着“侗台语族”分类的提出，学者们日益深入地阐释了侗族语言的文化特征及其跨境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语言人类学意义上的国际合作。杨权、郑国乔、杨通银指出：

从语言学观点看，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共同性较之其与南亚的关系更为突出。不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更多的抽象意义上，侗台语在这一语言学区域中都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最富有差异性的地域大体分布在湘、黔、桂毗邻的三角地带。⁽⁴⁶⁾

石林也从侗台语族的跨境关联和跨文化视野出发，强调了“侗语在东亚语言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地位”。⁽⁴⁷⁾面对由语言研究拓展的开放局面，学者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

中外侗语以及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与互访，给侗语走向世界、让世界理解侗族与侗族语言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⁴⁸⁾

从中国与世界内外关联角度展开的侗学表述，种类丰富，成果繁多，除了前面提到的语言学领域外，还有石开忠、林淑蓉等展现的鼓楼建筑和侗俗研究，以及龙宇晓与纳日碧力戈等合作进行的山地民族研究及世界萨满对话等多项议题。

“山地民族研究”的价值意义，在于突破侗族自身的身份边界，将其与其他同类民族连为整体，通过更为宏观的认知框架，进行跨界关联的文化阐释，并由此提出了以山地为特征的文明类型。龙宇晓的观点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山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孕育了多民族的文化也生成了独特的山地人文生态和意义生态，是族群多样性比较突出和文化多样性资源十分富集的地区。”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将学者们在《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特别推出的山地专栏成果称为“中国山地文明研究的新探索”。⁽⁴⁹⁾

在潘年英的文学人类学表述中，侗乡山寨虽扎根本土、依存中国，但又因与世界的关联而产生了人类的普遍意义，亦如他在《边地行迹》序言里总结的那样：

侗乡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其内涵着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同时也内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空间。走进侗乡就是走进一种不同的文化，结识这种文化会使我们对于人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着更加深切的体会和理解。⁽⁵⁰⁾

笔者以为，在对“中国侗族”的侗学阐释中，最值得关注的代表性成就当推对侗族大歌的评述与阐释。以多民族国家为统一格局的侗歌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便已肇始，以薛良、方暨申、萧家驹等为代表的音乐学家们站在“中国音乐”乃至“世界音乐”的宏观角度，通过与中外文化中的音乐对比，肯定了侗族音乐的突出特色和价值意义。例如，萧家驹将侗歌视为“中国民间支声复调音乐中颇为重要的一种”，继而从世界音乐的视野出发，将其同俄罗斯的民间合唱等进行比较，明确提出“不能按照西欧的‘和声’或‘对位’之类的标准”来予以衡量和评价的重要主张。⁽⁵¹⁾

方暨申也由比较音乐的角度展开，高度肯定了侗族大歌的普遍意义，认为通过对侗歌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探索合唱(支声)的规律、同类音调的灵活使用原则、民间大型联唱曲的结构组织。”⁽⁵²⁾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萧家驹等汉族专家的开拓奠定了侗歌研究的跨文化基础的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张勇、张中笑和吴浩等大批侗族学者的加入，又使之得到了显著推进。例如，在对前辈成果加以总结后，张中笑明确提出要以非“欧洲音乐中心论”和“汉族音乐中心论”为基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学”。⁽⁵³⁾

对于这种拓展的出现，笔者在当年就作了及时回应，认为结合当时国内音乐研究的整体背景看，促使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音乐理论家们多年来要为中国音乐有无‘多声传统’证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到在以和声曲调见长的西洋音乐面前，中国音乐的世界地位及其当代形态从理论到创作的发展走向。”⁽⁵⁴⁾

非但如此，侗歌研究的内外关联意义还在于学者们采用人类学实地调研的田野方法，深入侗乡民间的村村寨寨，借助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参与观察，打通文学、音乐及民俗的多维度和多视角，不仅推出一批兼具理论与实证风采的民族志成果，而且通过与其他国音乐的学术对话，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关注对象和推动学术生产的重要资源。⁽⁵⁵⁾例如，来自澳大利亚的音乐人类学博士凯瑟琳·英格曼(Catherine Ingram)深入贵州侗乡做田野，不仅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叫英倩蕾，并且学侗话、唱侗歌，用英文发表侗歌论文，将侗学研究的成果引入国际学界，受到中国同行的称赞，相关的学术报道评论说：作为外文化研究者，英倩蕾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文化研究者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热爱，以及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做的努力。⁽⁵⁶⁾

如果以贝壳的开合为比喻，阐释“中国侗族”的表述对侗学研究的意义的话，可以说其中的“开”，即指对传统边界的突破，使侗学视野扩展至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所谓的“合”，则又让论述的对象回归本己，令学术的成果回馈侗乡社会。并且，在人类学表述的整体意义上，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局部开合，都意味着对全球知识做出了贡献。

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侗学研究的成果不少，值得总结重估的亮点也多。相比之下，与国内学界宏观层面的“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及“藏彝走廊”等呼应，侗学表述的“跨省侗乡”“无冕王国”“文化边地”及“中国侗族”等堪称中观层面的突出成果，标志着当代中国民族研究与人类学理论整体中不可忽略的重头戏。

由上述新观念、新范畴组成的侗学表述，不但参与和构建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并融入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推动了中国新时期的多元一体践行。

侗学研究以侗族及其文化为对象，研究者却不限于侗族成员，而是包括了从李方桂、邢公畹到萧家驹、伍国栋以及林淑蓉、英倩蕾等族内外、海内外众多不同族别的同行学者。作为一门逐渐形成体系的学问和理论话语，侗学以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为基础；反过来，日趋成型的侗学研究同样充实了现代中国的国家含义。

此外，将侗学研究现状与其他民族的同类成果，如苗学、藏学、蒙古学等做横向比较也是需要的。潘年英就强调过这样的比较，认为在研究的系统性及标志性成果的出版方面，还存在相对差距。他呼吁说：“侗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希望同志们加倍努力，埋头苦干，争取在各自的领域取得较好成绩，为侗族文化的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⁵⁷⁾

注释：

1 孙中山、黄兴、章炳麟：《军政府宣言》（《同盟会宣言》），1906年颁布。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

2 吴正彪：《少数民族身份叙事与理想诉求：〈梁聚五文集〉的学术思想评析》，《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76-79页。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

4 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5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

6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

-
- 7 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8 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第3-11页。
- 9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第124-128页。
- 10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 11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 12 胡艳丽、曾梦宇:《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刍论》,《前沿》,2010年23期,第151-153页。
- 13 张瑾、吴忠军:《新农村建设中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人文地理》,2011年第3期,第83-88页。
- 14 吴浩:《三省坡脚的孤坟和假墓》,引自杨志一《侗学研究的新力作——评〈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85-86页。
- 15(28) 杨志一:《侗学研究的新力作——评〈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族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第85-86页。
- 16 吴文志、石佳能、吴浩、石干成:《构建“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专家访谈》,《民族论坛》,2010年第8期,第26-27页。
- 17 牛志男:《守望三省坡:湘黔桂三省区侗族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考察纪行》,《中国民族》,2014年第2期,第43-49页。
- 18(19)(20) 徐新建:《沿河走寨“吃相思”——广西高安侗族歌会考察记》,《民族艺术》,2001年第4期,第188-205页。
- 19 龙宇晓:《迈向中国侗族研究的新境界——中国侗族研究丛书总序》,参见石林《侗族语音语法及名物的多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
- 20(27) 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 21 陶潜《桃花源记》,《古文观止》卷7,中华书局1959年。
- 22(25)(29) 邓敏文:《桃源深处是侗乡——〈侗款研究〉引论》,《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82-83页。
- 23 王安石:《桃源行》,王兆鹏、黄崇浩编,《王安石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 24 向零:《洞款乡规及其演变——对侗族社会组织形式、功能及其演变的探讨》,《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第6-14页。
- 25 斯科特:《文明缘何难上山》,2007年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演讲文,收入《斯科特与中国乡村》,民族出版社,2009年。

-
- 26 杜树海:《山民与国家之间——詹姆斯·斯科特的佐米亚研究及其批评》,《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第92-103页。
- 27 徐新建:《山地研究的话语遗产》,《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2-9页。
- 28 潘年英:《土著者说》,《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18-24页。
- 29 参见潘年英《山河恋》(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风情现代散文小说随笔作品集),封面宣传语,新星出版社,2018年。
- 30 张泽忠:《侗族歌谣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1 廖开顺、石佳能:《侗族“月亮文化”的语言诠释——评张泽忠小说集〈山乡笔记〉》,《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47-51+62页。
- 32(39)安妮·居里安:《中国文化边界旁的文学》,《风雨桥》,1998年第3期;潘年英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5fb8601008n8j.html.2008年3月16日上传,2020年12月19日下载。
- 33 王铭铭:《潘年英书序》,王铭铭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e490680100azmv.html.2008年10月20日。
- 34 徐新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4-27页。
- 35 杜维明: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文化中国:以边缘为中心》),美国人文学会学刊《Daedalus》,1991年第2期。
- 36 张泽忠著、张清澍图:《大地之居:一个东方音乐民族的建筑艺术》,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6页。
- 37 会务组:《会议手册》,打印本与电子版,2020年10月31日。参见中国教育战线:《贵州师范学院成功举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山地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2020年学术年会暨中国侗族研究回顾与展望论坛》,2020年11月5日,https://guizhou.eol.cn/gzgd/202011/t20201105_2030792.shtml。
- 38 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侗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页。
- 39 杨权、郑国乔、杨通银:《中美学者合作的结晶——〈侗台语比较研究:台语支以外的语言调查〉述评》,《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142-145页。
- 40 石林:《侗语在东亚语言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苗侗文坛》,1992年总第13期。收入石林文集《侗台语比较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19页。
- 41 谭厚峰:《侗族语言文字研究六十年回眸》,《西南边境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251-259页。
- 42 龙宇晓:《中国山地文明研究的新探索》,《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0期,第14页。
- 43 潘年英:《边地行迹·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44 萧家驹：《侗族大歌·序言》，贵州省文联编：《侗族大歌(嘎老)》，贵州人民出版社，1958年。

45 方暨申：《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音乐研究》，1958年第4期。

46 张中笑：《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思绪录》，《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3期。

47 徐新建：《侗歌研究五十年》(上)，《民族艺术》，2001年第2期，第134页。

48 参见徐新建：《沿河走寨“吃相思”——广西高安侗族歌会考察记》，《民族艺术》2001年第4期；潘年英：《走进音乐天堂：侗族大歌之乡小黄村田野考察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杨晓：《嘎老音乐传统与侗人社群认同：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侗寨为个案的考察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Catherine Ingram (英倩蕾)，Hwun hwun jon ka (“Listen”): Kam Villagers Singing Big Song in Early Twenty First Century China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0；杨毅：《歌与生活——人类学视阈下的侗族大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49 白佳欢：《在碰撞与交汇中探寻中国音乐的足迹——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音乐当代研究暨第22届“磬”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音乐》2019年第11期，第78-81页。

50 潘年英：《侗学研究的未来之路——在全国侗学论坛上的发言》，2012年6月28日。引自潘年英博客，2012年7月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5fb8601017013.html。